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

俞大伟 袁 雷

(吉林大学 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以改革开放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为背景,详细阐述体育对外援助所进行的具体工作,归纳其时代特点:①政治色彩居主导地位;②援助重点为第三世界国家;③援助的规模不断增加。总结其取得成效:①扩展了国家利益的实现;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③推动了国际体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体育对外援助;援建体育设施;体育援外教

中图分类号:G8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60(2014)01-0053-06

China Sports Foreign Aid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YU Dawei, YUAN Le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aking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a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specific work of sports foreign aid and sums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1) the political color occupies dominant position; 2) the aid focuses o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3) the aid scales the increasing ceaselessly. It sums up its success: 1) expa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winning the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foreign aid; sports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sports foreign aid coach

对外援助一直是我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家喻户晓的口号至今还回荡在人们耳旁,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顺利实施带来了良好的开端。改革开放前,国际政治格局变幻莫测,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也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大环境的变化。从援外教员的支援到体育场馆设施的援建,从外派体育专家的指导到进行体育人力资源的培训,形式不断变化,规模逐渐增加,为新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而如今的国际社会环境依然十分严峻,情况更加复杂,给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进行研究,有助于抓住历史发展的脉搏,来应对今天瞬息万变的环境。

1 体育对外援助产生的背景

1.1 外部环境

二战结束后,世界大国开始按照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基本原则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在美苏均势基础

之上形成了两分天下、共同主宰国际事务的两极世界政治格局。1946年1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应邀访问美国。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前往密苏里州富尔顿进行参观,并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和平砥柱”演说。他在演说中公开抨击苏联的势力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至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整个欧洲大陆已被一幅‘铁幕’所分割,苏联正采用军事手段和意识形态高压控制着铁幕以东的国家。面对苏联的这种行为,决不能采取妥协政策。作为雄踞于世界权力顶峰的美国,此刻应承担起世界的重任,并建议英、美结成同盟,将所有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制止苏联的野蛮‘侵略’”。不到10天,斯大林针对富尔顿演说发表讲话,严厉谴责丘吉尔和美国发表的反苏、反共演说。“和平砥柱”演说又称铁幕演说,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1.2 内部环境

伴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和国内战争的节节胜

收稿日期:2013-09-26;修回日期:2014-01-08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理论构建与拓展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890047)。

作者简介:俞大伟(1977-),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通信作者:袁雷(1968-),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E-mail:yaunlei@jlu.edu.cn。

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一边倒”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外交战略设想。毛主席认为,要保卫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苏联的存在和声援至关重要,失去苏联的帮助,我们极有可能被吞掉,那将损害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有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中国就不会孤立。苏联提供的以“156项”为核心的全方位援助,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效恢复和全面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让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刻地体会到,对外援助对于支持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发展落后国家的民族经济是多么的重要。因此,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和6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1]周总理进一步强调“中国是一个刚刚解放不久的国家,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独立。”“但是由于我们认识到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帮助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2]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展起来的。

2 具体工作

1957年,在全力配合外交工作的情况下,在中央领导的亲自关心和指示下,中国拉开了体育对外援助的序幕。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下,原国家体委派出了新中国的首位援外教员。

上海体育学院是新中国首家成立的体育专业院校,在1961年接受了原国家体委的援助任务,为柬埔寨皇家足球队进行短期培训。加纳是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我国于1962年向其派出了援外教员组,提供科研和技术支持,促进非洲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蛮行径,由印度尼西亚发起、亚非拉国家联合响应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原定于1963年在印尼举行。此时正是中国处于三年经济困难的恢复时期,中国仍然倾其所能,既无偿援建了体育场馆设施,赠送了大量的体育器材,还独自负担了所有非洲参赛国家的往返路费,确保了新运会的如期召开。

1963年9月1日,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代表北京体育学院,为阿尔及利亚青年和体育部捐赠了一大批体育器材^[3];1964年11月21日,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代表原国家体委,向古巴全国体育

运动文娱委员会无偿赠送了四百三十六箱体育用品^[3];1965年3月9日,中国驻刚果(布)临时代办甘迈代表原国家体委,为刚果(布)青年和体育部赠送了一批体育器材^[4];4月17日,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代表原国家体委,把一批体育器材赠送给阿尔巴尼亚体委^[4];7月24日,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临时代办张昌代表原国家教委,把一批体育器材赠送给索马里教育部^[4]。

1965年1月,为有效保障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的顺利实施,原国家体委援外办公室正式成立。

1966年11月25日,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将在柬埔寨举行。西哈努克亲王提出了诚恳的请求,非常希望中国在比赛场馆和运动员村的建设以及大会经费等方面给予援助。

为了保证第一届亚新会的成功举办,经国务院同意并批示,中国将为柬埔寨无偿援建体育馆一座和可容纳千名运动员的国际村一处,无偿赠送大批体育器材和部分大会经费。1966年1月18日,中柬双方代表在金边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我国政府对此项援助工作十分重视,责成有关部门快速组建了援柬工作领导小组,直接指挥援外的具体工作,并外派技术组亲赴现场,加强施工指导。1966年3月正式开工,仅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坐落在金边市区国家体育场西北面的这座体育城就竣工了。体育城是个面积达一万九千平方米的建筑群,包括一座体育馆、八幢四层的宿舍楼以及一些田径和球类的训练场地,内部设备也比较完善,有洗衣房、餐厅、电话室等。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有所恢复之际,我国主观地预测将要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并盲目地进行“三线建设”,同时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造成了国内经济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困难阶段,但我国仍独自承受着不断加重的负担,毫无保留地向第三世界国家继续实施体育援助。由国家体委直接筹建、以贷款方式援建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市体育场,于1966年6月24日至27日由双方政府代表换文确认。整个工程主体是一座看台可容纳1万名观众的体育场,在体育场看台的西侧有遮阳挑棚的贵宾席、北侧有可供节日阅兵和检阅游行队伍时使用的检阅台、南侧有耸立在8座灯塔上的足球记时记分牌,灯塔的照明设备首次安装了国内最新试制成功的长弧氙灯,还在半腰集中安装了高音喇叭,与分散布置的音箱相配合,

可以使体育场内各个位置都能很好地观赏精彩比赛;在看台下面,有供所有赛会人员休息的房间和浴室;有供工作人员使用的办公区,还有供观众使用的公共区。除主体运场外,场区内还建有多球类训练场地和1栋4层楼的运动员宿舍。这座体育场的建成,对推动坦桑尼亚体育事业的发展,促进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的国际体育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67年4月,我国无偿援助索马里价值4万多元的体育器材;12月,帮助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扩建达累斯萨拉姆国家体育场内的原有办公楼、宿舍楼、训练场等相关设施,当时耗费的工程费用达到了约12万英镑^[5]。

随着体育对外援助的发展,援助规模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原国家体委的《有关援外方面的请示》报告,我国于1971、1972和1973年,分别向数十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无偿赠送了一大批体育器材;给尼泊尔援建了一个能容纳3500人的大型体育场;将国内最现代化的长沙室内游泳池图纸,赠送给了阿尔巴尼亚体委;并在对外经济援助贷款的有力支持下,为埃塞俄比亚援建了体育场馆,这些援助所涉及的金额十分巨大。

3 指导原则——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随着援助工作初具规模,指导其实施的原则进一步确立。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上,正式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通过加纳记者向全世界宣布,并正式写进1月21日中国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为中国的对外援助确立了基本准则。在发表中国和马里联合公报的当天,周总理在几内亚民主党总部出席杜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盛大文艺晚会的演出前讲话时,再次阐述了八项原则的基本精神。他指出:亚非国家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民族经济,要互通有无、互利短长、互相帮助;所有的援助都应相互支持,都要必须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对受援国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八项原则是周总理智慧的结晶,是吸取了中央领导人援外思想的精华,并总结建国以来外援实践的精髓提炼出来的。它阐明了中国援外的性质和宗旨,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证明了中国一再强调的平等互利、坚决反对附加任何条件与特权的主张,表明了中国政府将始终遵循真诚无私、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原则,具体体现了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有机融合。这就将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根本上区别于以达到操控受援国政治、经济命脉为目标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发展国际关系的典范。周总理强调,它既适用于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也适用于中国对所有受援国的援助。它的提出与实践,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反映了国际交流的客观需要,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基本准则,从理论上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体育援助提供了指导原则。

中国在进行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决不代表着中国缺乏关注他们和平与发展的诚心,而是要做到完全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全力支持他们的独立发展。历史经验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深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疯狂掠夺及对他们自我发展的强烈干涉造成的。所以,只要想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完全尊重他们自我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相反,西方国家在实施对外援助时经常附带苛刻的条件,要么提出获得额外的政治经济特权,要么希望借此对受援国实行所谓的民主改造,最终将受援国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战略轨道。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目的不同,是在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实际需要和自身实际可能的情况下,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虽然“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2]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经说过:“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6]在执行援外任务中,中国人民诚实、勤劳、守纪律,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赢得了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友好感情和信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那些凝聚着中国建设者心血的一个个大型体育工程设施依然屹立在亚非大地,仿佛一座座无言的丰碑,诉说着中国建设者感天动地的传奇故事,见证着中国人民与亚非拉人民的友谊与真情。

4 主要特点

4.1 政治色彩居主导地位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认为,外交政策对保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抵御外部环境施加的强大压力尤为重要,而对外援助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因此,他认为对外援助无论采取什么

样的形式,其本质都是政治性的。中国的体育对外援助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制度和领袖思想的影响下,在具体工作中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5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批转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中说,“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7]

作为中国援外教练第一人的史老因骨折而退役,正当他在广州二沙头进行恢复治疗,上级组织交给了他新的使命,就是赴友好邻邦越南执教他们的国家足球队,还说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史老立刻领命,服从组织安排,于1957年启程奔赴越南。当时史老的执教背景是:北越足球队刚刚在一场比赛中输给了南越足球队,不久后就要访问金边,并在那里与南越队再决高下,史老带队的任务就是击败南越队,只能赢不能输,这关乎政治影响。史老经过短暂的训练和了解,因材施教,只做了一个小小调整就收到了奇效。他将队中的边锋改打中锋,充分利用了这位选手身体素质出众的特点。到了比赛那一天,北越这边全体人民放假,听收音机转播比赛实况。比赛第20分钟,正是他施出的妙手决定了比赛的胜负。这位新任中锋攻入了全场唯一进球,取得了比赛胜利。后来回到北越,范文同总理让大家都到机场迎接教练员,大家高兴得像打了一场胜仗。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左倾思潮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逐步加强。毛主席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作用和影响,大力宣扬“中国革命中心论”,将中国视为“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的决策将“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在这样的思潮下,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更应把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视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逐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此时期,中国进行的体育对外援助基本上都是无偿援助,没有量力而行的援助给我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其结果不言而喻,以至于自身不堪重负,但这足以充分说明体育对外援助主要是政治色彩居主导地位,而将经济因素置于次要位置。

4.2 援助重点为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帮助贫困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从建国之日起就一直把体育对外援助作为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从社会主义国家

到非社会主义国家,从建交国家到未建交国家,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到欧洲,所涉及到的援助对象、区域、范围和数额不断增加,但是援助的重点却始终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这个特点既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决定,也和中国对自身的认识及定位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是具有三重身份于一体的大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是新兴力量国家,这样独特的身份就决定着他不仅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还要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贫困与动荡。同时,中国还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盟军,为了实现“世界革命”的理想,要对正处于革命和建设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重点援助。

从1957年初至60年代初,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对外政策,援助的国家都是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反美国家,大部分的体育援助给予了越南、古巴、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支援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主要内容。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的决裂而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认识出现了较大分歧,遭受到美苏双重干涉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了中国反对美苏夹击的盟友,中国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成了在第三世界反对美苏的重要方式。可见,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十分关键,他们不但属于第一中间地带,而且处于“斗争的最前线”。因此中国对美苏实施“两面开攻”,大力开展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援助。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8]“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9]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真正体现到了实践之中,从建国伊始到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阶段,有20多个正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得到了援助。从我国援建的体育场馆都在非洲可以看出,中国的外交战略需求和国际责任相一致,始终以第三世界国家为重点。

4.3 援助的规模不断增加

1957年,中国在“一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为北越战胜南越派出了一只援外教练队伍。当时的援助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安全角度考虑,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苏分歧

不断加大,两国竞相加大了对对外援助力度,都希望通过此项政策来结交盟友,从而强化自身的力量。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直到决裂,中国明确提出了坚决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政策,其中典型的事例是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共产党突然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理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毅然站出来反对苏共的行为,从而遭到了苏联的政治恫吓和经济遏制,并随即取消了所有对阿援助,中国立刻向其提供了大额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作回报。1965年4月17日,代表国家体委的中国驻阿大使许建国,向阿尔巴尼亚体委赠送了一批体育器材。1966年5月9日,我国外派田径教练1人,篮球教练2人,排球教练1人,射击教练1人,去阿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为阿提供的经援总额高达9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阿人均得到4000元人民币、约1吨的粮食,这些指标远远超过了中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在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以后,我国在援外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但这种精神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落实,不断增加的援助规模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即便在国内经济建设极其需要物资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做出了“援外物资优先”考虑的指示,即“优先安排援外设备生产,优先保证援外产品所需协作配套产品、原材料、嫩料、包装物料的供应,优先安排运输力量。”^[10]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我国却在1966年外派了建国以来人数最多的31名援外教练员,还依然向坦桑尼亚援建了体育场项目。此项目于1966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1969年11月胜利竣工,直到1970年1月1日,才由坦方管理使用。工程跨度将近4年,无论从资金和人力投入等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即从周边国家起步,逐渐向外扩展,援助区域遍及世界,援助规模不断增加。

5 取得的成效

5.1 扩展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对外援助是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延伸,也是外交的重要手段。世界发展进程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外援助便日益凸显出它的巨大威力,“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既对战后西欧的经济恢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经久不衰,延续至今。历史经验说明,无论是以社会

制度为阵营还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所划分的朋友和敌人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同样,对外援助的方针和政策也应该是动态的。此时期,我国形成了从对苏联的“一边倒”,到转向对美苏“两面开弓”的对外政策,正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安全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政策转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这一宗旨。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出外交工作就是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

摩根索提出“无论何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对外援助虽然对受援国帮助和扶持意义重大,但主要还是援助国实现其对外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意义同样重大。对外援助应该是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一种交换行为,但我国在此时期的体育对外援助却是一种无偿的赠予。这是由于向第三世界国家倾其全力的提供援助,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中的中国而言,体现出一种政策宣示的意义。他表达了中国愿意为国际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成为了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的窗口,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支援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巩固了中国同亚非拉各国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在恢复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在1979年举行的国际体联会议上,科威特体协主动联合阿拉伯国家的所有体协,集体赞成中国重新回到国际体联的大家庭中,有效推动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5.2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发展中国家具有艰难的成长历程,相似的历史命运紧紧地大家团结在一起。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自成立之初起,便主动与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同呼吸,共命运,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在急需大量资金恢复自身元气的困难情况下,依然舍身为友,无偿赠送了大量的体育援助,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良好声誉,促进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顺利开展,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帮助,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从未间断地派出了大批体育援外教练和专家,为第三世界国家援建了价值不菲的体育场,给贫穷落后的国家无偿赠予了数量众多的体育器材,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情怀和真诚友好的民族精神,巩固了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友谊。1971年10月25日,以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国为首提交的议案获得通过,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大家庭,这个著名的“两阿”提案是由23个发

展中国家提出的,可见这个提案代表的就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

5.3 推动了国际体育事业的发展

在 1963 年举行的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柬埔寨的比赛成绩很不理想,一枚金牌也没有得到,总成绩仅仅处在亚洲参赛国家中的第九位。因此,为了有效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支持柬埔寨在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应柬埔寨的要求,我国向其派出了空前的援外团队,加大了外派教练的力度。1965 年 1 月 19 日,两名教练员被派往柬埔寨帮助工作;1966 年 2 月 20 日,3 名教练员被派往柬埔寨帮助工作;1966 年 4 月 8 日,9 名教练员被派往柬埔寨帮助工作;1966 年 10 月 8 日,3 名教练员被派往柬埔寨帮助工作。在本次赛会上,柬埔寨的比赛成绩斐然,跃居三甲,将 13 块金牌、33 块银牌和 58 块铜牌收入囊中,同时打破了 11 项新兴力量运动会纪录,刷新了 36 项全国纪录,受到亚洲各国的一致好评^[11]。我国外派的焦点始终是优势项目的教练员,他们会把中国先进的训练手段和方法无私地奉献出来,带领受援国取得显著的骄人成绩,不仅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体育事业的能力,树立了体育对外援助的典范,还会极大地推动国际体育事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中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更是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赞誉。1984 年,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到非洲视察,巡游列国的同时参观了很多当地标志性的体育场馆,这些体育设施都是中国政府无偿援助的,他被这种无私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清楚地了解有些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是嘴上说说而已,有些国家却要附带很多政治条件,而中国却是为国际体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实际行动。为了表示对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肯定和感谢,国际奥委会将象征着国际体育组织的最高荣誉奖授予了中国,并在 1986 年 4 月由萨马兰奇本人亲自来华,向中国奥委会亲手颁发“奥林匹克杯”,以表彰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对国

际体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6 结束语

改革开放前的体育对外援助是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在新中国生存环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产生,并在举步维艰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为当代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际社会这个外部环境极大的影响着体育对外援助的方针和政策,造就了它独特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在以周总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由援助周边国家为主逐渐扩大到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体育援助规模和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是可信的、负责任的国家。

参考文献:

- [1] 杨代云. 当代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1: 22.
- [2] 谢益显.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172 - 173.
- [3] 国家体委编. 中国体育年鉴 1963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5.
- [4] 国家体委编. 中国体育年鉴 1965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2.
- [5] 俞大伟.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回顾[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 33(8): 39 - 41, 45.
- [6]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85 - 08 - 20.
- [7] 石 林.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31.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2 - 1473.
-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16.
- [10] 陈慕华.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8: 119.
- [11] 俞大伟. 我国体育援外教练工作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0(5): 16 - 18.

责任编辑: 刘红霞